

人民日报谈地方债怪相:地方欠债越多 官员提拔越快

“地方债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中国地方债比美国金融危机更危险”、“地方债风险一触即发将失控”……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众说纷纭。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有多大?为何快速增长?债务风险是否可控?怎样构建地方政府新融资机制?记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力求寻找客观而理性的答案。

地方债总额中 约有 40%为或有债务

新一轮审计摸底已开启,专家预计,地方债务仍在总体可控的安全区间

目前的规模有多大,是地方债问题的焦点之一。对此,很多学者和机构都做了推算:18 万亿元、20 万亿元,近日有外投行甚至认为会超过 24 万亿元……这些数字的可信度有多高?

关于我国地方债规模,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于审计署两次对地方债务的审计。

第一次是 2011 年 3 月至 5 月,审计署对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全面审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0.7 万亿元。

第二次是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2 月,为摸清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变化情况,审计署对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 2011 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底,这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 3.85 万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12.94%。

贾康说,审计署 2011 年的审计,将地方债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地方政府明确直接负有还本付息责任的债务,占比 60%多一点;二是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三是地方债务是形式上看不到跟地方政府有关联,但实际上债务出现还本付息问题会把地方政府牵连进去、存在连带责任的债务。

“事实上,第二、第三部分只能算地方政



府或有债务,发生不发生,发生多少,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调控性。”贾康说。

今年 8 月初,审计署开启了新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地方债审计摸底,但目前还未形成最终审计结果。

“根据第一次审计的地方债务总额和第二次审计部分地区地方债务的增长速度,以及对部分地区的调研,我预计地方债务的总额仍在一个总体可控的安全区间。”贾康说。

地方债高增长,源于体制性原因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事权划分不清、唯 GDP 的政绩观、投资效率偏低等共同推高地方债

地方债早已有之,近年来之所以成为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源于规模的快速增长。连年高增长,原因何在?

“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许多理由。”贾康说,诸如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而兴办的投资项目和经济增长点建设,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大型公益项目和改善市容市貌等。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深刻的体制性原因。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我国在 1994 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没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至今在省以下没有真正贯彻分税制,而是演变成为五花八门、复杂多样、一地一率、讨价还价色彩甚浓的分

成制和包干制。”贾康说。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农业、交通、教育等诸多支出项目都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总体模糊,但在具体场合又往往在不断强化,超出其财政能力。

“往深里讲,除了被动举债的压力外,地方政府也有主动举债的动力。”赵锡军说。

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借债—开发—盈利—还债”的逻辑:通过举债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明显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还可以使城市土地得到大幅度升值,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而用于偿还债务。

在政绩考核压力下,投资可以对 GDP 增长有更加直接的拉动作用,让地方官员“面子上更好看”。甚至还催生了一个怪现象:欠债越多的地方,发展得越快,地方官员提拔得越快。

“尤其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更有举债的压力和动力。”中国城镇化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海说,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在 2010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 10.7 万亿元中,有 5.24 万亿元形成于 2009 年和 2010 年。

严格来说,如果运作得当,地方政府这种“先借债发展,再盈利还钱”的思路并没有太大问题。但现实中,不少地方恰恰在“还钱”环节出了问题。这就是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职能合理化与综合绩效考评却没有跟上。往往借钱很轻松,还钱很费劲。”贾康说,一些地方领导急于在任期内表现“政绩”,导致建设项目热衷于“短、平、快”,发展规划和项目立项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与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密切相关的这些行为,导致投资效率明显偏低,同时还增加了债务风险。 (摘自《人民日报》)



宗庆后: 房地产泡沫已形成 中国不能再造房子了

“推进城市化建设,不开发房地产业也不现实……”10 月 26 日,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上,湖南省浙江商会会长徐文忠还没有说完,便遭到宗庆后的反对:“中国不能再建房子了!”

“城镇化”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中国 2012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遭受“摊大饼”、粗放发展等各种诟病。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此前表示,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之下,借助推进城镇化之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产业支撑,没有人流物流集聚,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乔润令说,根据调查,目前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附近都要搞一个新区,其规划占地和人口甚至于远远超过老城区,多地出现了空城,部分城市房产项目的空置率也极高,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

本届浙商大会上,浙江方面也专设“新型城市化”议题,与天下浙商商讨重塑浙江先发优势。

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郭占恒在开场特别强调,城市化不等于城市。他也认为,部分城市化走入一个误区,以为把城市建设等同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本意是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要走的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本身就涵盖了新农村的概念。”郭占恒说。

他介绍,浙江自 2003 年开始就实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也是旨在促进城市化的同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此前因被砍伤手指而备受关注的内地前首富宗庆后此次也出现在世界浙商大会上,并以嘉宾的身份出席当天下午浙商论坛。

他对城镇化过程中的“造房子”的现象持不同意见,直言“不能再造房子了!”

他说,自己在全国都有工厂,现在不光是城市有空置房,农村也有空置房。“房产泡沫已经形成了,再造房子不得了。”

宗庆后认为,让两亿六千万农民工从城市里回到家乡务工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他表示,现在浙江的城市化经济首先是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经济后,农民工再就近务工,进行土地流转等。

新型城市化道路究竟如何走?记者了解到,目前湖南浙江商会已与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一个小城镇基金。

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伟峰介绍,基金将在浙江一些城市群周围的中心镇和卫星镇建设过程中给予重点支持。他认为这将使草根的松散的浙商通过金融工具连接方式,打造小城镇建设的新格局。 (摘自《中新网》文/ 赵小燕)

德媒称中国失业率 是蹩脚谎言 未计算农村劳动力

中国的失业率几十年来差不多一直保持在 4%——不管经济形势好坏。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中国失业率为 4%。该数字只在 2009 年春季出现过短暂攀升。但中国的首个经济刺激计划又将它再度压低。压低至多少?当然是 4%!目前,中国的失业率为 4.1%。毫不奇怪,几乎没有哪位看重自身声誉的经济学家会严肃看待这一官方失业数字。它迄今更多被用作反映国情的模糊依据。

但是,中国失业率令人瞠目结舌的稳定绝非只是一个蹩脚的谎言。它也与数据的统计方式有关。中国在统计失业率时只计算城市人口。中国实行一种严格且僵化的户籍制度:在城市出生的人被登记为城市居民,而在农村出生的人则差不多一生都被注册为农民。而在中国,农民并非没有工作,但他们依然是农民的身份。

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严格划分有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原因。由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力负担全部 13 亿人口的社会保险,因此只有城市居民享有这一特权。作为补偿,农村人口获得土地进行耕种,实现自给自足,并可收获盈余出售给城市居民。

但随着工业化发展,近 20 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自己的耕地。他们涌入工业发达地区,作为农民工在工厂中谋生存。尽管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但在农村的调查显示统计中依旧被视作农民。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已经上了大学并通过其他方式事业有成。一些人早已坐进城市的写字楼。但在官方数据中,他们仍是农民。

如果中国经济像过去几年那样在某些领域出现巨大波动,受影响的将主要是出口业、建筑业或造船业,而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又主要是农村人口。他们是否失业并不会反映在统计数据中,因为他们的官方身份依旧是农民。

因此,现在存在这样的怀疑,即由于中国主要面向欧美的出口出现明显下滑,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大幅上升。在出口业发达而直到不久前还以“世界工厂”闻名天下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衰退。很多工人已经重返农村,重新开始耕种。

中国早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拥有高度错综复杂的国民经济。与其他工业国家一样,中国数据需要掌握有关国际失业率的可靠信息。因此,李克强总理领导下的新一届政府已经委托统计部门,改变数据的统计方式。眼下,工作人员正在像做人口普查一样,在全国展开挨家挨户的调查,登记居民的就业现状。

这是一种进步。虽然在中国,家庭或许仍是最好的失业保险,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应当知晓他们面临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摘自《参考消息》文/费利克斯·李)

编者按:
今年初,决策层提出要扎实做好“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我们认为,养老金筹集和使用事关每一个人,而且关系到一代又一代人,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典型。我国处在经济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解决好养老金的公平、延续和激励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在民生指标越来越成为衡量执政成果和目标的今天,这个硬骨头必须要啃了。我们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果断破除双轨制,其次是建立起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作为一块制度硬骨头,有关养老金制度的突破已经来临。

“前不久,多部委组织专家针对养老制度改革召开了闭门会议,具体政策还在研究中。”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透露。

据记者了解,10 月 15 日-16 日召开的闭门会议,来自 4 家国内研究机构和 3 家国际研究机构的专家讨论了双轨合并、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全国统筹养老金等养老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等焦点问题,并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相关部门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

据悉,截至目前,养老保险还有约两亿人未覆盖,大部分是就业流动性强的农民工。

对于社保待遇水平的后续工作,胡晓义表示,一是要建立社保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二是要完善社保待遇与缴费更紧密

养老金改革成三中全会硬骨头 首要是破除双轨制

联系的激励机制;三是要推动多层次社会保险的发展。

双轨制合并或将有结果

据胡晓义介绍,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一是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政策;三是要推进社会保险城乡统筹。

从 1949 年后的计划经济年代,到 1978 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再到开始迈向老龄化社会之时,中国的养老制度一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修订。回顾我国养老制度的推进过程发现,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曾在上世纪 50 年代讨论未果,至今仍处在试点阶段。

从《公务员法》到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再到十七大报告,一次次把推动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写入其中。但直到 2007 年,国务院也只是通过了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继续在广东、上海等五个地方试点。但以上海为例,其实最早在 1993 年就已开始了试点。

胡晓义说,“双轨制”、“待遇差”问题的存在虽然有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差距过大,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要在不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同时,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胡晓义透露,为实现社保制度更加公平,下一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工作重点首先就是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会及早提出合理建议,但目前并轨问题暂无明确时间表。

全国统筹养老保险势在必行

胡晓义表示,要建立社保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以工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物价变动等为重要参数,统筹考虑各

类群体,形成有规划、有规则的调整社保待遇的机制。

“全国统筹”已经成为国内不少研究学者的共识,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严重碎片化,结构不清晰。”十二五”期间,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养老金制度必然需要调整结构。”

摆在养老制度改革面前不能忽略的就是科学设计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目标,只有充分考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总体要求,才能实现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

对此,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大体上已经走完了第一个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顺应经济体制改革而对社会保障体制进行‘被动式’改革的话,第二个阶段则是根据社会保障内在的发展规律,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不适应进行主动的制度调整。这应当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升级’的基本内涵。”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离退休人数增长的速度快于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增长,中国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非改革不可的,不然将不可持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曾强调。

全国统筹、延长缴费年限、双轨制合并以及养老金保值增值等焦点问题都应该在这次改革中做出规划。养老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中国社会保障升级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不可或缺的版图,也是“中国梦”的基础保障。对于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我们拭目以待。

(摘自《证券日报》文/ 左永刚)

21 国教师调查:中国教师地位最高收入倒数

近日,国际教育机构巴乐基 GEMS 财团发布了一份名为“全球教师地位指数”的报告书,对 21 个国家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中国中小学教师中的地位最高,但平均工资却排在倒数第二。

中国对校长的尊重程度 低于教师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地位指数最高,为 100,其次是希腊(73.7)、土耳其(68)、韩国(62)和新西兰(54),而巴西(2.4)和以色列(2)排名最低。报告表示,中国、韩国、土耳其、埃及和希腊比其他欧洲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更尊重老师。

有一半左右的中国家长鼓励孩子以后当老师,排名第一;相比之下,只有 8%的以色列家长做出肯定答复。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埃及家长是最有可能鼓励孩子当老师的,而以色列、葡萄牙、巴西和日本则相反。

同样,未成年人对老师的尊重程度,中国也排第一。有超过七成的受访学生认为中国未成年人尊重老师,而其他国家给出肯定回复的平均值,只有 27%。

具体来说,在中国,人们对中学老师的尊重程度大于小学老师,再大于校长。对校长的尊重程度低于老师的,只有中国和希腊,“这可能与不同国家校长的不同管理角色有关”,报告表明,21 个国家中,英国对校长的尊重程度最高。

唯有中国将教师类同于医生

报告认为,薪酬体现了一个职业的受尊重程度。在待遇上,报告指出,中国中小学教师平均年收入为 17730 美元(已根据购买力因素进行调整),排在倒数第二位,仅高于埃及。排名前三为:新加坡 45755 美元、美国 44719 美元和韩国 43874 美元。

此外,调查中,唯有中国受访者认为教师是同医生地位类似的一个职业。在多数国家,教师被认为地位类似一个职员,而在美国,教师被认为地位类似图书管理员。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敏强认为,现在在中国,教师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职业,教师的地位和收入也在渐渐提高,而且中国有尊师

重教的传统,所以这项调查得出中国教师地位排名第一的结果不足为奇。至于中国教师平均年收入是否有 17730 美元,张敏强说,如果这项报告取样是在中国大城市的话,中小学教师年薪 10 万元人民币算是比较普遍的。

教师地位到底高不高?网友看法不一,不少网友认为这个结论不靠谱,更有人直言“好假,看工资就知道了”;但也有网友认为,现在教育资源紧缺,教师地位不低,“老师确实地位高呀!现在上个小学甚至是幼儿园都要走后门,过节家长还要给老师送礼!”此外,也有部分网友指出,提高教师地位,紧要的还是提高工资。

(摘自《南方都市报》万蜜 刘倩)